

## 哲人已逝 魂兮归来

——缅怀汪长炳、钱亚新二师

张德芳

(四川省图书馆)

说来惭愧,一直在我心中以师执看待的汪长炳和钱亚新老师,何时返归道山的,我自己一直都不知道。直到南京图书馆寄来的“关于纪念汪长炳、钱亚新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”征文通知,我才了解他们已先后在1988年和1990年谢世了。

我没有在他们授教的“社会教育学院”读过书,但我一直认为我是他们二位老师的学生,因为我在1957年听过他们的课。

我第一次看到汪长炳先生是在1956年7月,那是文化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期间。我的图书馆知识浅陋,不知道此次会议之前,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召开过这种全国性图书馆工作会议,但我却直觉地感到,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老一辈图书馆学专家,除汪长炳、杜定友、杨作平等公共图书馆馆长外,其他的应邀参加会议的北京大学、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,如刘国钧、徐家麟、王重民、皮高品、吕绍虞诸先生,无不神采飞扬,意气风发,以能参加这一盛会为荣,神情始终处在及其亢奋状态中。汪长炳老师是我老家江苏省的省图书馆馆长,当我从会务处打听到他并把真人与姓名联系上后,当然十分关注他,但我却无缘同他接触和结识。原因很简单,我在西南、西北联组,他在华东、东北联组,而且在小组会外,他又经常地同他的老同学、老朋友、那些我的师执之辈在一起活动,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,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谈笑风生地在一起交谈、讨论,而自己却由于情怯、不善交际,不敢去接近他们、打扰他们。

但是,我终于有一个机会一睹汪长炳先生的风采了。那是会议进入到讨论新中国公共图书馆方针任务时,与会代表,确切的说,是会议的领导小组出

现了意见分歧,主持会议的文化部某副部长认为:公共图书馆应当面向大众、面向工农兵,把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作为自己的方针;而会议领导小组的另一成员,中宣部科教处的于光远处长则提出另一种看法,他认为:图书馆是人类的知识宝库,除了应当为工农兵服务外,还应当为广大群众服务;除了应当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服务外,还应当为科学研究服务。在这次联组会议上,各个代表发言踊跃,争论很激烈,特别是各地来的代表,大多支持某副部长的主张。这时,我却意外地看到汪长炳先生从老专家丛中(老专家开大会时常聚坐在一起)首先站了起来。他个子很高,样子很帅气,用一口湖北话作了将近十分钟的发言。他的讲话独辟蹊径,不是站在争论的哪一方,而是提出:县以下公共图书馆应当面向工农兵,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服务,而地、市以上的公共图书馆除应当面向工农兵、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服务外,由于它们的藏书较丰富,人力资源较充沛,还应当责无旁贷地为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服务,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。他的讲话获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。至今,近五十年过去了,我对他那次讲话的印象仍然很深,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,虽然他不是会议的主持人,却真正地抓住了会议发展的脉搏,推动会议向更高层次发展,他不愧是个老专家。

1956年那次会议后不久的1957年3月,我有幸参加了文化部在南京举办的全国公共图书馆采编人员进修班,在进修班期间我真正地听他讲课了。但我感到愧疚的是,那一次进修班全国老一辈专家差不多都给我们讲过课,内容丰富,题材广泛,对于我们偏处各省的全国图书馆学员来说,简直是如同走在小阴道上,应接不暇。事过五十年,我现在不仅对

汪长炳先生讲课的内容记不清了,甚至连他讲课的课题也忘了。留下的唯一印象是:他作为东道主,进修班的主要行政负责人,从教学安排到生活管理,全部由他组织,使进修班有条不紊地进行,而且他还能抽出时间备课,给我们作学术讲演,这实在是真正地难为他了。

钱亚新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则是完全不同于汪长炳先生的。1957 年春,我同四川的几位学长程仲琦、王文德、谢申甫、程德芳去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进修班,当我们下了轮船,急急忙忙赶往南京图书馆报到时,进入成贤街,由于年龄小,走的又快,首先进入南京图书馆,门口站着的一个老人(其实并不老,但在当时我看,已算老人)正是钱亚新先生,虽然我在西师图博科学习时,已看过钱先生的《校仇略研究》等著作,知道钱亚新先生是位学者,但我却不认得他,当我以为他是南京图书馆收发室的看门人,正准备向他打听在何处办入学手续时,幸亏学长程仲琦他们赶到了,程仲琦、王文德是他的学生,当他们放下行李,极其恭敬地向他问候时,钱亚新先生却不管不顾地抢着帮我们提行李,拿网篮,带我们去报到。那时,我是真正地被感动了,一位著名的专家、教授,却那么毫无架子,那么平易近人,那么热情地对待学生、后辈。

在整个进修班学习期间,钱亚新先生同汪长炳先生一样,作为东道主,整天忙碌着,操劳着,他也同样给我们讲了课,作了地方文献的专题学术报告,但遗憾的是,他那一口地道的宜兴官话,连我这么一个离宜兴很近的南京人没有能听懂多少,更何况其他各省学员了,我只是后来当他的报告被铅印成活页教材,重新加以细读时,才觉得自己真长了见识,扩大了我对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认识。

同样感到遗憾的是,在进修班的两个月期间内,我仍然是由于胆怯、不善于抓机会请教老师,主动去接触钱亚新先生,向他请教并结识他。

我真正地对钱亚新先生学术成就有着系统了解,是在 80 年代中期,编辑《图书馆学论丛》那套国内图书馆界、情报界五十位专家自选集的时候。当时,学兄金恩晖、卢子博等同我共同编辑这套出版物,我认真地拜读了钱亚新先生的文章,由于自选集有十万字左右容量的限制,钱亚新所选文章只是他全部科研成果的冰山一角,但我已从中看到了他在目录学、考证学、校勘学、版本学等领域默默耕耘所

取得的学术成果,是那么深邃、精辟、丰富、有创见。读他的文章如同读乾嘉学者的文章一样,回味无穷。不久前,我在所写的一篇介绍我印象最深的老一辈图书馆专家的文章中,专门提到了他,提出他是我国传统图书馆学学者中一位杰出的学术带头人。

我同汪长炳先生、钱亚新先生从初次结识到现在,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,半个世纪说短也确实不短了,经过许多年的风风雨雨,我对二位前辈,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。

汪长炳先生应当说是一位杰出的图书馆管理专家,但遗憾的是,在他生前,国内图书馆界并没有给过他这样的评价。现在想起来,其根源有二,一是: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较晚,图书馆学观念陈旧,不知道图书馆管理是一门大学问,是图书馆学和管理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,因而对图书馆管理这门学科的价值认识不到位;二是,汪长炳先生的图书馆管理的学识与才能,由于仅仅局限在一个地区、一个图书馆,它的社会影响与价值自然不容易充分显示出来,更何况,在我国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的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,由于大家所知道的社会背景,他的这一专家才能,也无法充分地发挥作用,这可以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大损失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,1978 年冬初,他来四川参加全国图书馆学术筹备会议。有一天,在峨眉山红珠山宾馆,他同我有一次长时间谈话,他有几个意义很深的观点,一是:拨乱反正,图书馆界最重要的是进行图书馆学基本知识的宣传,进行 ABC 教育,这是针对图书馆有大量新人进入而提出的一个十分中肯的意见;二是:拨乱反正,图书馆首先要解决的是,实行与政府行政管理不同的图书馆行政管理,使图书馆的人、财、物能得到有机配合、充分发挥作用。这又是在当时一个独具慧眼的看法;三是:全国图书馆学会即将成立了,图书馆事业的振兴指日可待了。图书馆之间不仅要加强学术交流,而且应当加强工作间交流,如工作经验、干部培训、馆际协作等。这也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卓越见解。他的那次谈话给我的启发很大,我也在我工作中,尽可能地付以实施了。古人说有一字师,而汪长炳先生对我来说,就不是一字师了,而是全面指导我成长的教师了。汪长炳先生的学识、才能,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未能得到充分发挥,他如有在天之灵,是会感到十分遗憾的。如果我们今天仍不能正确地加以评价,那就不是感到更加遗憾,

## 汪长炳先生与公共图书馆精神

徐忆农

(南京图书馆)

公共图书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,19 世纪中叶,英、美等西方国家陆续兴建起的近现代意义公共图书馆,是古代藏书楼演变为近现代图书馆的主要标志。在中国,公共图书馆是 20 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,从本质上看,它是在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而引进的一个外来事物。

最近,中山大学教授程焕文先生撰文说:“当我用全方位的视野来审视‘图书馆世界’(Library-World)的发展时,我发现:‘图书馆世界’是一个很

有趣的‘三维空间’——一个由‘图书馆事业’、‘图书馆人’和‘图书馆精神’组成的‘三维世界’。”<sup>[1]</sup>公共图书馆是图书馆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类型,因而如果采用程先生的观念,也可以把“公共图书馆世界”描绘成一个由“公共图书馆事业”、“公共图书馆人”和“公共图书馆精神”组成的“三维世界”。回望历史,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,正是经过那些具有真正“公共图书馆精神”的几代“公共图书馆人”不懈努力,才使公共图书馆事业经受住百年

而是一种悲哀了。

钱亚新先生在我的心目中,是一个十足的书生型图书馆学专家。这样说,没有一点贬义,因为,我是十分尊重这种类型的专家的。不久前,我在一篇文章中,论述我国近代图书馆学中的三个代表人物,刘国钧先生、钱亚新先生和杜定友先生,就把钱亚新先生列为代表人物之一。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种看法,文献学、目录学、校勘学、版本学、考据学的图书馆学专家,不仅对于提高图书馆的文化品位具有巨大的价值,而且对于拓展图书馆学研究领域,加强图书馆的社会地位,具有决定性作用。应当说,钱亚新先生正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中这方面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。还是在 1957 年春的文化部举办的进修班上,和我同一小组的师兄,上海图书馆的杨铿,在听过钱亚新先生的学术报告后,就对我说:“钱先生的报告,对我的启发太大了,我原来专门从事《史记》一本的索引编制工作,听他的报告后,我找到了深入研究的门径。确实,文献的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,缺乏这种研究,图书馆工作的内涵会越来越浅薄的。”(大意)我不知道杨铿师兄现在是否还健在,但我却是十分赞同他的这

一观点的。但可惜的是,图书馆界象钱亚新先生这样埋头做学问的书生型人物,是越来越少了。在我国图书馆界,如果缺乏或没有像钱亚新先生那样的书生型图书馆学专家,图书馆还能称是文化事业单位吗?

一位图书馆界管理专家,一位图书馆文献专家,同时也在南京图书馆工作,这是南京图书馆的骄傲与光荣。尽管受时代局限,一位的学识与才能没有充分地得到实现;受认识局限,一位的价值与研究成果没有获得社会公允的评价(我以为)。但他们献身于图书馆事业的精神却是为全国图书馆界所公认的,随着岁月的流逝,他们的学识、才能、价值与所取得的成果,也会日益展示出来。

哲人已逝,希望南京图书馆能有更多的汪长炳先生,钱亚新先生那样的现代哲人出现,在新时期图书馆事业建设中发挥更加夺目的光彩。

归来!归来!汪长炳先生、钱亚新先生,魂兮归来!!!

(作者信息:四川省图书馆研究馆员,邮编:610016。)